



中國商業史研究叢書

商會與近代中國 政治變遷

李培德 編



商會與近代中國 政治變遷

李培德 編



香港大學出版社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香港大學出版社

香港田灣海旁道七號

興偉中心十四樓

© 香港大學出版社 2009

ISBN 978-962-209-124-5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圖片，
如未獲香港大學出版社允許，
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本社提供網上安全訂購保障

<http://www.hkupress.org>

良友印刷廠有限公司承印

商會與近代中國 政治變遷

中國商業史研究叢書

出版緣起

中國商業史研究叢書是由一班有興趣從事近代中國經濟、社會、政治史研究的學者發起，他們當中有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歷史人類學家，分佈香港、中國大陸、台灣、日本和美國。出版叢書的目的在於鼓勵更多的學者加入中國商業史研究行列，並提供一個出版平台，讓更多相關主題的研究專著、學位論文、研討會文集等，經過評審程序，編輯出版，以達到進一步提高中國商業史學科水平的目的。

本叢書將着力發展以下的一些課題，包括：清末官商關係、商人和商會活動、廣告和商標、國貨運動和展覽會、亞洲跨區域商業網絡、上海資本市場、金融和保險、海關和匯款、消費文化、市場秩序、外國在華企業、家族企業、會計和會計師、個別商號和企業家、企業經營和管治等等。歡迎聯絡叢書總編輯李培德，電郵〈ptlee@hku.hk〉。

編輯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排列)

朱蔭貴
李培德*
林滿紅
科大衛
高家龍 (Sherman Cochran)
馬敏
張利民
陳錦江 (Wellington K.K. Chan)
黃紹倫
虞和平
濱下武志
戴一峰

復旦大學
香港大學
臺灣國史館
香港中文大學
美國康奈爾大學
華中師範大學
天津社會科學院
美國洛杉磯西方學院
香港大學
中國社會科學院
日本龍谷大學
廈門大學

* 總編輯

作者簡介

何佩然：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李培德：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專職研究員

馬敏：華中師範大學校長、歷史研究所教授

章開沅：前華中師範大學校長

陳忠平：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張志東：前香港《明報月刊》編輯

張素玉：香港愛德基金會海外幹事

葉漢明：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

序

《商會與近代中國政治變遷》作為「中國商業史叢書」之一種，即將由香港大學出版社付梓問世，作為始終提倡並關心商會史研究的我，自然非常高興。

記得1982年春天，我在芝加哥一次大型學術會議上初次介紹中國商會檔案時，能夠理解其重要價值者尚屬寥寥。經過海內外史學家二十多年的共同努力，商會史研究現已蔚然成風，而且成果累累，進展越來越快，成為史學領域一個重要分支。

但是，由於主客觀條件的限制，中國內地學者過往的研究，大多局限於國內商會，而且又過分側重於蘇州、天津與上海。現在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本書所收論文作者多數任教於境外與外國，這樣就把華人商會研究的範圍延伸到更為廣闊的海外。從歷史上來看，國內外華人商會創建之始關係就比較密切，特別是在民族危機深重時期，更是同仇敵愾，聲氣相通，例如二十世紀初的抵制美貨運動以及抗日戰爭時期海外商界的協力支援國內抗戰，便是典型事例。因此，我曾多次建議，應該聯合海內外史學界熱心人士共同編寫一部大型的包括海外各地華商在內的中華商會通史。這一設想，已由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中國商會研究中心牽頭，正在逐步付諸實踐之中。

中國是一個大國，各個地區經濟、文化乃至社會結構各有差異。海外華商遍佈世界，僑居國家和地區情況更是千差萬別。坦率地說，中國商會史研究目前仍然處於童年，仍然不夠成熟，編寫中國商會通史必須先從地區、個案研究着手。只有把地區、個案商會史研究好了，編寫商會通史才有堅實基礎。

海內外學者共同撰寫大型商會通史，肯定存在許多意見分歧，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學術不同意見的爭論是學術進步的驅動力，而且只有經過充分坦率的爭論才能逐步求得相近共識。

即令達不成共識，也完全可以求同存異，盡可能保存各個撰著者自己的理論、方法與風格。這是一部更為成熟的大型商會通史的必經階段。我很欣賞目前學者有關商會研究應該「在商言商」的說法，盡量從商人的實際出發，作合乎商人所思、所言、所行實際情理的陳述與闡析，避免在不必要的名詞、概念上兜圈子。這也許是不同國家、地區眾多學者合作編撰中國商會通史的最佳選擇。

培德索序，正值我將參與西安公祭黃帝之行，匆匆急就，聊以奉陳，不當之處，尚祈作者與讀者不吝指正。

章開沅

2009年仲春於桂子山



於清末成立的中國商會多有「由上而下」的性質，圖為上海商務總會議董合影，由徐鼎新提供。

目錄

著者簡介	vii
序	viii
章開沅	
導論	
中國的商人政治和商會	1
李培德	
1. 制度合作與國家建設	7
——提供一個理解 1928 至 1937 年 商會與政府關係的概念框架	
張志東	
2. 長江下游商會與辛亥革命關係新探	29
陳忠平	
3. 從商會看地方領袖與國家政權的關係	51
——民國時期山東濰縣個案的探討	
葉漢明	
4. 從工商聯到商會——中國商會的現代演變	73
馬敏	

5. 二次大戰結束前香港的華人商會 李培德	91
6. 地方經濟力量的興起與衰落 ——香港新界沙田商會的個案 何佩然	105
7. 華商組織、國家與政治特權 ——以菲律賓為例 張素玉	123
8. 中國商會、商人團體史研究文獻目錄 李培德	137
索引	193
後記	197

導論

中國的商人政治和商會

李培德

有關商人與政權關係、商人參與政治的研究，中外研究成果甚多，但能以商會、商人團體作個案來討論的，還不多見，這也是目前商會史研究的一大特色。清末中國為推行改革，頒布商法。值得注意的是，因為商法的施行，商人地位被肯定，有學者認為由於商人支持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成功，亦等於中國資產階級(*bourgeoisie*)革命成功，¹這說法是值得商榷的。過去學者對中國商人「階級化」和硬套「資產階級」之標籤，都是不對的。²不過，有關商人的代表性、政治地位等問題，從清末開始，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都未被徹底解決。有關此問題，最引人注意的，莫過於對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曾否在中國出現的爭論。³爭論的焦點在於政府對商人的管理和控制、商人參與政治等問題。有關這一方面，目前我們的研究還有欠成熟。

目前，我們於中國商人政治和商會史的研究，已積累了不少成果，加上中國自改革開放後所出現的對政治改革的訴求，有關民間商會地位問題，又重新引起了討論，吸引社會各界的關注。暫且擱下理論分析方法不說，隨着近年商會檔案的陸續被發掘、整理和公開，有助於商會史研究的順利開展。據統計，1912年時全國有商會 52 家、商務總會 891 家、商務分所 1000 家。⁴不過，現在我們的研究只能集中於天津、蘇州和上海少數的商會，實在不多。這三家商會的檔案加起來並未超過二萬卷，與全國各地商

會檔案總數的十二萬三千卷比起來，還有相當大的距離。⁵這批近百年以前的商會，究竟是如何組織的？受誰人指揮？

商會可以說是包容和平衡各種政治勢力的場所，商人既要利用這個平台來達到各種政治目的，歷來各統治者亦須拉攏商人來穩定政權，以能實施有效的統治，因此商會介乎商人與政權的中間地位，至為明顯。到底，商人是熱心公益，愛國？還是唯利是圖，喜歡投機？當然，不能一概而論，但商人懷政治目的參與社會事務，甚至干預政治，並不稀奇。不過，正如學者所指，當中央政權力量薄弱之時，地方為求自保，商人便有機可乘，乘勢崛起。相反，當中央政權處於強大之時，商人的機會便相對地小。⁶中國自辛亥革命以來，直到1927年南京成立中央政府，再到十年後即1937年爆發抗日戰爭，中央政權可謂都處於弱勢，正是本書所要討論商人、商會與國家政權拉鋸和此起彼落的複雜關係。

本書共收錄七篇文章，無一不以商會為主要討論對象，換句話說，都是以與國家政權的關係來進行分析的。張志東利用西方政治、經濟和社會學的理論，以鎖定分析所謂國民政府黃金十年（1927至1937年）時期中國商會的發展，認為商會與政府的關係是屬於「制度合作」類型的社團主義。在民族主義與現代國家建設的制約條件下，中國商會根本無法抵抗來自國家政權的干預。中國商會受到此特定歷史環境的影響，只可選擇與制度合作。張志東的說法，不僅有助我們理解近代中國商會與政府的關係，同時展開了本書以下其他幾篇文章的討論。陳忠平反對過去中外學者對辛亥革命前中國商會是軟弱無力的資產階級組織的說法，把商人對支持清末改革和孕育辛亥革命的貢獻一筆抹煞。武昌起義後，長江下游的商會並沒有一味附和革命，而是根據商會自己本身的地方利益因應各自的地方形勢而對革命作出不同的反應。商會雖不能說是決定性的政治力量，但作為獨力自主的商人菁英組織，商會的活動無疑促使了政治權力從滿清轉移去南京臨時政府，並最後過渡到袁世凱政權。

葉漢明根據山東濰縣的個案分析，給我們一個對中國地方領袖的微細觀察，展示出由士紳到紳商，由紳商到商人的轉型，以及地方城市中「公共領域」的出現，不過卻始終受到政治權威的限制，「公共領域」無法栽種於民間社會。此說法剛好回應了張志東所提出的商會「類型」，地方領袖向國家政權靠攏，以換取利益。值得一提的是，這種情況在1937年後日本佔領濰縣時同樣發生。

馬敏的論文討論商會於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所出現的轉變。首先，於1950年代如何過渡、改組成為工商聯。其次，於1990年代中國在改革開放時，工商聯又如何重新回歸到民間商會。正如作者所指，中國商會的最大轉變，莫過於同時掛民間商會和工商聯的兩塊牌子。1994年底，全國各級工商聯組織共有二千多個，由工商聯協助成立的行業商會、行業協會、同業公會、地區商會、異地商會等新商會組織，可謂多不勝數。這種由上而下的改革，引證了中國於改革開放後出現的巨大社會轉變。

除了中國內地的商會外，有兩篇論文是討論海外的華人商會的。香港與內地不同，社會管治由殖民地政府執行，在自由貿易政策底下，吸引了不少福建人來港經商，他們更在港成立商會。李培德利用過去鮮為人知的東京大學仁井田陞文庫的資料，對孕育於殖民地環境的香港華人商會，進行了分析。香港華人商會和內地的商會不同，首先沒有《商會法》的保障，華人要組織商會大多利用有限公司條例或社團條例向政府登記註冊。其次，商會的組織商業味道濃厚，捐助經費金額的大小決定了會員從商會所獲得的名譽和地位，猶如一盤生意。第三，組織商會的目的均不涉當地政治。第四，商會的規模以中小型為多，組織模式則較接近行會；會費不設定額，由會員每日進行的買賣交易金額抽成給商會。第五，1930年代香港華人商業多有所發展，連帶商會的影響力亦由港島延伸至九龍。

何佩然則以香港新界沙田商會為個案研究，利用口述資料和沙田地方文獻，闡述該會於1959至1980年期間的一段歷史。雖然時間不長，但沙田商會見證了沙田地方經濟勢力的冒升，而這新興地方力量最後又因政府推行新市鎮發展計劃而遭打擊，踏上衰落之路。值得注意的是她指出了1950年代沙田墟市的興起及至1980年衰落期間，墟市的發展與沙田商會存亡的直接關係。張素玉在闡述她對菲律賓華人商會的分析時，先說明了菲律賓不存在政團組織的獨特環境，因而菲華工商會聯會得到國家政權之垂青。不過，商會對於政府的干預一直不敢反抗。雖然，商會的領袖與總統私交甚篤，但只可說明馬可斯要利用華人來吸引外來投資。張素玉認為菲華工商會聯會與國家政權的結合，並不取得菲律賓國人的同情，特別是在1997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國人對華人的看法多是負面的。

最後，本書附有〈中國商會、商人團體史研究文獻目錄〉，收錄範圍包括學位論文、書籍、期刊、論文集和書評論文集等，總數約五百條。

註

1. Marie-Claire Bergere (translated by Janet Lloyd), *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1911-1937*(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140-186.
2. 筆者贊成科大衛的說法，見David Faure,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Reconsidered: Business Structure, Political Status and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Class* (Brisbane: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in Asian Business History No. 3, Asian Business History Centr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2000), pp. 3-8.
3. 有關黃宗智 (Philip Huang)、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 和羅威廉 (William T. Rowe) 對中國市民社會討論的文章，收入 *Modern China*, Vol.19, No. 2 (April 1993). 柯偉林亦認為將西方民主制度模式強行與中國比較，是沒有意思的，見 William C. Kirby, "Introduction," in William C. Kirby (ed.), *Realms of Freedom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7.

-
4. 洪振強〈清末民初 (1902-1927) 商會網絡結構探析〉，《華中師範大學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年4期，頁80-85。
 5. 朱蘭蘭〈近代商會檔案的分布特點及價值〉，《民國檔案》2006年2期，頁126-132。
 6. Wong Siu-lun, "Decentering: The Rise of Hong Kong as a Network Society," in *Social Transformations in Chinese Societies*, Vol. 2 (2006), pp. 163-187.

